

# 「梁山七器」與周代巡狩之制\*\*

陳 絜\*

## 摘 要

大保簋銘中的榆地，也就是商末田獵卜辭中的主要田獵地點「榆」，一度屬商王近臣小臣兪所有，但隨著周初紂子聖叛亂的平定，該地便成為召公奭的私屬領地，其大致地望當在今山東肥城句窰亭一帶。故「梁山七器」的真實出土地點大體也應在梁山以北的肥城附近。燕召家族在泰山腳下所領有的榆地，其性質如同鄭國的「泰山之祊」與衛國的「相土之東都」，均屬東方諸侯襄助周天子祭祀泰山的「湯沐之邑」。湯沐邑的設置，與周天子巡狩東土的制度有關，但天子巡察四土斷然不能像禮家所規劃的那樣嚴整，就目前材料可知，西周十二王中，真正巡視過東土的唯有成王、康王與穆王三位。

**關鍵詞：**梁山七器、巡狩制度、湯沐邑、商周地理、榆

## 一、前 言

「梁山七器」乃商周時期最為著名的青銅器群之一，通常認為，該器群包括小臣兪犀尊、大保鼎、大保簋、大史友甗、憲鼎、徯鼎（同銘器共二件，

---

2014年8月18日收稿，2015年3月10日修訂完成，2016年3月14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本文的撰作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殷墟田獵卜辭綜合研究」（13YJA770006）、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西周金文地名集證」（14AZD112）與南開大學「百名青年學科帶頭人」培養計畫經費的支持。又承蒙《漢學研究》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於此謹致謝忱！

舊亦稱「大保鼎」)等七件青銅禮器。其中小臣兪犀尊乃晚商器物,器主與燕召家族無關。後六器的年代均在西周成康時期,大保鼎與大保簋為召公奭本人所鑄,其餘四器之器主則屬召公奭之子侄輩。據傳,該銅器群乃清代咸豐年間(一說道光年間)在山東壽張梁山出土,故有此名。該器物群出土後,輾轉於私人藏家之手,現除大保鼎、憲鼎尚分藏於天津博物館與清華大學圖書館而外,其餘悉數散落海外,令人扼腕嘆息。七件器物均鑄銘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故相應的研究成果甚為豐碩。<sup>1</sup>尤其是上個世紀末,隨著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的發現與發掘,這批器物再次得到學界高度關注,研究者紛紛將其與克壘、克盃等燕國早期重器聯繫在一起,綜合探討周初封建之制與燕召宗族歷史等重要問題,<sup>2</sup>所得結論可謂精彩紛呈,於先秦古史尤其是燕國早期歷史之勾勒,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則,「梁山七器」的史料價值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歷史信息,恐怕尚有進一步發掘探討之餘地。例如,商末小臣兪犀尊何以會與周初大保家族重器一起出土?大保簋銘中「錫休榆土」之「榆」究竟位於何方?其背後又究竟隱含著怎樣的歷史背景與史實?如此種種,至今尚缺乏清晰而穩妥的解釋。即便偶有提及,論述亦多語焉不詳;或者論證過程史料單一,沒能與殷墟卜辭材料相聯繫,從而影響結論的可信度。另據文獻記載,周代甚至更早便有天子巡狩之制,又有周成王等封禪泰山、巡狩東土之說,但巡狩制度究竟存在與否?始於何時?「梁山七器」所反映的史實是否與周代巡狩制有關?諸如此類的問題,饒有趣味,值得探討。故筆者不揣淺陋,欲就上述問題提出

- 1 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及白川靜《金文通釋》等專著均有不同程度的論及。至於零篇散帙或在其他文字中偶所論及者,更是不勝枚舉。
- 2 例如殷璋璋等,〈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銘銅器座談紀要〉,《考古》1989.10: 953-960;殷璋璋,〈新出土的太保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90.1: 66-77;殷璋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1991.1: 1-22;李學勤,〈克壘克盃的幾個問題〉,載常宗豪、張光裕等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1993),頁309-349;陳平,《燕史紀事編年會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44-150;朱鳳瀚,〈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與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載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遠望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303-308;陳絜,〈燕召諸器銘文與燕召宗族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頁16-25。

一些粗淺的意見，以供方家同道批判之用。

## 二、大保簋銘「榆土」地望及其相關問題之考辨

大保簋（圖一·1）鑄有銘文4行34字，其文曰：

王伐录子取（聖），諱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遺，王侃大保，易（錫）休榆土，用茲彝對命。（大保簋，《集成》4140，<sup>3</sup>成王，圖一·2）



1. 大保簋



2. 大保簋銘文拓本  
《集成》4140

圖一 大保簋及其銘文拓本

就銘文本身而言，還算淺顯易懂，目前有所爭論的恐怕就是其中的「榆」字，例如郭沫若讀「杓」、<sup>4</sup>李學勤則主張讀「櫟」。<sup>5</sup>其中李先生的說法就字形而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發明，也確實可以與《說文》「讀如集」的「△」字相照應，值得關注。但經過綜合考慮，筆者還是傾向於舊有「榆」字之讀法。當然，對其中的取捨理由，還得略事交代。

按大保簋銘「榆」字原篆作「𣎵」，與我們在卜辭中習見的、呈左右結構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4140，大保簋。以下引用該書簡稱《集成》並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4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頁27。

5 李學勤，〈紂子武庚祿父與大保簋〉，載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4。

的「𣎵」、「𣎵」、「𣎵」、「𣎵」諸字形有所差異，然則商周古文字形體結構尚欠穩定，大保簋銘「榆」字，就是從習見的左右結構變成了上下結構，且「木」字豎道與「𣎵」字所從「𣎵」形之豎筆互相重疊，用專業術語講，便是偏旁部首間的筆劃借用，以求文字結構勻稱，避免形體過長而失其美觀。事實上，殷墟卜辭中也有寫作上下結構的「榆」字之例，如「王自𣎵入」<sup>6</sup>（《合集》3458，賓組）、「其田𣎵」（《合集》37634，黃組）者即是。所以，從形構角度而言，舊釋為「榆」字應該也是有其道理的，問題不是很大。但如果考慮到後文將要涉及的大保諸器與小臣兪犀尊同出之事實，及其與卜辭榆地的內在聯繫等問題，筆者還是主張堅持傳統的釋讀。當然，有些學者事實上是把它簡單等同於「余一人」之「余」的，這自然不可取。<sup>7</sup>

金文動詞「休」，與賞、賜義同，如金文習語「對揚王休」、「奉揚王休」、「對揚魯休」與「對揚休命」之類，其「休」字一概當解釋為賞賜。所謂「錫休」，乃同義複合之詞，故有時可顛倒而作「休錫」（頻吏鬲，《集成》643），講的仍然是賞賜之意。由此可見，該銘文的主旨是說，鑒於大保奭討伐象子聖有功，成王便賜之榆土，以示褒獎。但榆土究竟在什麼地方，是否亦見載於傳世典籍，如此種種，恰恰是學界討論尚不夠深入細緻之所。

通常說來，既然「梁山七器」據傳是在山東壽張梁山出土，故今梁山一帶估計便是周初榆地之所在，很多學者也恰好是如此主張的。<sup>8</sup>但問題在於，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3458，賓組。以下引用該書簡稱《合集》並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7 按「榆」字所從之「𣎵」，如今通常直接隸定作「余」。但在古文字階段，它與作為人稱代詞的「余」字形構事實上有區別的，後者一般作「𣎵」，可參《合集》36511、36515、36522等卜辭。而「𣎵」乃「兪」字之所從，或者說是「兪」字的聲符甚至初文。所以，商周金文甚至戰國簡文中的「兪」字，通常寫作「𣎵」（龔鬲，《集成》688）、「𣎵」（兪伯卣，《集成》5222）、「𣎵」（不嬰簋，《集成》4328）、「𣎵」（《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113）等形，而春秋晚期的黔罇銘文（《集成》271）則兪、余二字並見，其「勿或兪（渝）改」之兪作「𣎵」，人稱代詞之余則作「余」，充分說明這兩個字原本並不相同。一直到《說文解字》，還是涇渭分明，不相混淆。後來被歸併在一起，如「兪」又可寫作「餘」，從而造成了今人在隸定、理解上的種種混亂。事實上，郭沫若在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便已注意到「𣎵」字與作為人稱代詞「余」之區別，故隸定作「桮」。

8 參（日）貝塚茂樹，〈關於殷末周初的東方經略〉，載劉文俊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8-121；陳壽，〈大保簋的復

該器物群實為盜掘品，非考古發掘所得。究竟為墓葬所出，窖藏所出，抑或其他情形而得，時過境遷，今人已無從求證。甚至說該器物群是否真的如傳言所講出自今梁山境內，恐怕亦不無疑問。<sup>9</sup> 古董商以逐利為目的而說的話，真假參半，無法盡信，如早期盛傳殷墟卜辭出自河南湯陰，便是一顯例。故我們只能大體推斷說，「梁山七器」出自今山東境內，容或不假，至於其具體出土地點究竟安在，還須從其他相關材料尤其是卜辭材料及新出簡牘資料中找其線索。

眾所周知，殷墟田獵卜辭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田獵地點，便是以「榆」為名。例如：

- (1) ……其田榆……在二月。(《合集》37634，黃組)
- (2) 丁丑卜，翌日戊王其遯于因，亡災。  
     于榆，亡災。  
     于喪，亡災。  
     于孟，亡災。  
     于宮，亡災。(《合集》28905，無名組)
- (3) ……  
     于喪，亡災。  
     于孟，亡災。  
     于向，亡災。  
     ……王遯于孟，亡災。  
     于宮，亡災。  
     王遯于榆，至于向，亡災。(《合集》28947，無名組)

例(1) 雖屬殘辭，但性質明確，榆為商末田獵地點無疑。所謂「遯」，也是一種與田獵有關的行為動作，舊釋為「送(弋)」，今從裘錫圭之說隸定為「遯」。<sup>10</sup> 故例(2) 是說商王想在戊寅日外出打獵，具體狩獵地點則在因、榆、喪、孟與宮五地中占卜選取。此類由卜選而形成的地名群，大致可以理

出與大保諸器》，《考古與文物》1980.4: 23-30；陳雪香，〈山東地區商文化聚落形態演變初探〉，《華夏考古》2007.1: 102-113。

9 如清儒許瀚便曾懷疑「梁山七器」出自山東之說，詳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5。

10 裘錫圭，〈釋「秘」〉，載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51-71。

解為均圍繞在占卜地（或駐蹕地）周圍，各個地點互相臨近，或至少相去不會過遠。例（3）與例（2）性質類似，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版卜辭中的最後一辭，即「王迄于榆，至于向」云云，該辭占卜商王前赴榆地田獵過程中欲途經向地，或在榆地田獵後抵達向地，沿途有無災妄。由此說明，榆、向二地大概是同一行進方向上相互毗鄰的兩個田獵點。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由對貞卜選而形成的地名群中的各個田獵點，相互間不可能相去過遠，最多就是一、兩天的行程，也即 80 公里左右的樣子。<sup>11</sup> 所以，對於這樣的地名群，倘若能知道其中某幾個甚至某一個地點的具體地望，其餘諸地的大體方位或範圍，基本上便可約略求得。循此思路，我們先具體討論卜辭喪地之地望，以為相關推論建立一個有效的座標點。

就現有材料推測，卜辭喪地，去今濟南歷城有一日行程，也即 40 公里左右。例如黃組卜辭《甲骨綴合續集》379（即《合集》36501+36752）有云：

乙巳<sup>[42]</sup>卜，在【商貞：】<sup>12</sup>王田斃，亡【災。獲】兕廿又□，【唯】來征人【方】。

丙午<sup>[43]</sup>卜，在商貞：今日步于樂，亡災。

己酉<sup>[46]</sup>卜，在樂貞：今日步于喪，亡災。

庚戌<sup>[47]</sup>卜，在喪貞：今日王步于香，亡災。

辛亥<sup>[48]</sup>卜，在香貞：今日王步于敢，亡災。

甲寅<sup>[51]</sup>卜，在敢貞：今日王步于奠，亡災。

據上引卜辭所載，商王己酉日在樂地占卜，而轉天的庚戌日則又在喪地卜問，很顯然，從樂到喪僅為一日行程。樂，據研究者考證，即《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樂」之樂，在今濟南歷城附近。<sup>13</sup> 故喪地殆在以今歷城

11 宋鎮豪以為商代馬車行進速度為日均 30 餘公里，詳氏著，《夏商社會生活史》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319。另（日）松丸道雄則以為半日內車馬的最大行進距離為 20 公里，也即日均 40 公里，詳氏著，〈再論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問題〉，載吳榮曾編，《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5。竊以為這些說法遠較「古師日行三十里」之舊說合理，當時實際的行進速度大致為 40 公里左右，參陳黎、趙慶森，〈「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孟」、「斃」諸地地望考察為中心〉，《歷史研究》2015.5: 56-75。

12 「商貞」二字據本版乙卯、丙辰二條卜辭補。按：陳夢家曾懷疑該辭田獵地點為商，恐怕是錯誤的。詳參氏著，《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04。

13 王恩田，〈甲骨文中的濟南和趵突泉〉，《濟南大學學報》2002.1: 39-42。劉桓，〈補

為中心，半徑 40 公里所作之圓的區域範圍內。而據他辭可知，喪又比鄰今臨淄西南的澆地，例如：

……在喪貞，【王】田澆，衣……

……在灤【貞，王】田，衣……（《合集》37562，黃組）

卜辭澆地，胡厚宣認為即《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去齊，宿於畫」之「畫」。<sup>14</sup>這一意見，目前已得到甲骨學界的普遍認可，且新出資料如《花東》505 也能進一步印證此說。<sup>15</sup>按畫為「齊西南近邑」，<sup>16</sup>也即齊國國都臨淄西南一帶。而上引卜辭說某日在喪地占卜商王前赴畫地田獵事宜，依照當時田獵行動常常是當日往返的現象推斷，喪、畫二地應相距不遠，大致就是半日行程（20 公里左右）的範圍內，最遠也不會超過一天。從今天的歷城到臨淄西南，其直線距離大概有 70 多公里，所以，喪應該就在樂（歷城）與畫（臨淄西南）之間而略偏向於東面的畫地，估計就是在今山東章丘市東南方向。

喪之地望既然已基本確定，則與喪形成對貞卜選關係的其他田獵點，即因、孟、榆與宮等，其總體範圍也就比較清楚了，它們基本應坐落在泰山的周圍，也即泰山的北麓、東麓、東南麓為主，個別則可能在其南麓。例如像卜辭孟地，或就在「相土之東都」的範圍內，大致位於「龜陰之田」附近。<sup>17</sup>倘若上述推論不誤，則榆地之地望便可聯繫相應的先秦文獻加以求證。

從《左傳》、清華簡《繫年》等各種史料看，位於泰山周邊、可能與卜辭榆地有關的地名殆有輪與句兪等兩地，因為榆、輪、兪三字，歸根到底均是从「个」得聲，理論上可以假借互用。現抄錄其文字如下，以便討論：

釋甲骨文尋、暝二字並釋「降永」，《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33。陳絜，〈鄒氏諸器銘文及其相關歷史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1: 13-26。

14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27。

15 鄒國盛，「商周時期的東夷與淮夷」（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2），頁 74-75。

16 《史記》〈田單列傳〉集解引劉瓘注，詳（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4），頁 973。

17 陳絜、趙慶焱，〈「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孟」、「斃」諸地地望考察為中心〉，頁 62-66。

- (1)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sup>18</sup>
- (2) 晉敬公立十又一年，趙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以與戊（越）命（令）尹宋盟於邾（紅），述（遂）以伐齊。齊人焉始為長城於濟，自南山逗（屬）至北海。晉幽公立四年，趙狗率師與戊（越）公株句伐齊，晉師閔長城句兪之門，戊（越）公、宋公敗齊師於襄坪。至今晉戊（越）以為好。<sup>19</sup>

第一條中的成邑，即魯三桓孟氏之采邑，在魯都曲阜以北、汶水以南的寧陽一帶，魯國在輸地築城，其主要目的據杜注是「以偪成」，也即威脅逼迫成邑，故輸地一定是在成邑附近，也應位於今寧陽一帶，似不會越過其北面的汶水。《繫年》「句兪之門」顯然與齊長城有關，竊以為在肥城句窳亭一帶。<sup>20</sup> 春秋輸地距離前述章丘東南的喪地，以直線計，殆已在 100 公里以上，以商周時期的行進速度，差不多得三天方可抵達，略顯遙遠，所以似乎可以首先排除。肥城句窳亭一帶，距離喪地大致有 70 多公里，正常行進差不多得用兩天，好像也不是很近。按泰山南麓及東南麓一帶，乃屬商代著名的「相土之東都」之範圍，在晚商時期儘管已經基本廢棄，但商王游獵途中於此地偶然駐蹕，亦非沒有一絲可能，例如：

丁丑卜，翌日戊王其田澧，弗擒。引吉。  
東斲田，亡災。擒。引吉。<sup>21</sup>（無名組）

據前引《綴續》379 記載，卜辭斲（斲）地，距商（也即《春秋》經傳之「鄆」<sup>22</sup>）僅半日行程，大致可以斷定，它應該坐落於汶水下游北岸的「汶陽之田」一帶。今商王在丁丑日占卜將於轉天的戊寅日前往澧地或斲地田獵，

1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哀公十五年」。以下引用十三經皆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1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繫年》，簡 111-113。以下引用該書簡稱《繫年》，並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20 參陳絜，〈〈墾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載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76-277。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0），2739，無名組。以下引用該書簡稱《屯南》，並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22 參陳絜，〈〈墾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頁 284。

考慮到當時車馬日進行速度大致在 40 公里左右，故可以想像，其占卜地（也即駐蹕地）位於澶、斃（祊）二地的中間地帶才比較穩妥，相對合適的地點便是在泰山之東南麓，也即「相土之東都」附近。從這裡出發，北上則可順淄水而下抵達澶地，南下則沿著汶水之西岸而至斃（祊）地，一切似乎順理成章。同樣，若從泰山東南麓一帶出發西進，一日稍多便可到達肥城句窳亭附近，向北則能抵於喪地，相應的行程差不多也是一天。

有鑑於此，故目前尚不能輕易排除肥城句窳亭與卜辭榆地的關聯性。設若「梁山七器」確實在泰山以南的魯中地區出土，那麼肥城句窳亭一帶，自然就成了卜辭榆地的首選之地。這就是說，召公奭因戰功所受之榆土，大概是在泰山南麓的肥城境內。而「梁山七器」的真實出土地點或在今山東肥城一帶，比原先傳說中的壽張梁山，要略微偏於東北。

已有學者指出，召公所受之榆土，原本應該是小臣俞的領地。<sup>23</sup> 這個意見恐怕是對的。下面，我們將聯繫小臣俞犀尊銘文及其他相關甲骨資料，對上述榆土地望之推論作進一步的討論。按小臣俞犀尊（圖二·1）銘文有曰：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錫）小臣俞夔貝。隹（唯）王來正（征）人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彤日。（商末，《集成》5990，圖二·2）



1. 小臣俞犀尊



2. 小臣俞犀尊銘文拓本  
《集成》5990

## 圖二 小臣俞犀尊及其銘文拓本

23 （日）貝塚茂樹，〈關於殷末周初的東方經略〉；陳壽，〈大保簋的復出與大保諸器〉；郝導華、董博、崔聖寬，〈試論齊國的交通〉，載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349-367。

「唯王來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云云，是指商紂王十五年第二次征討人方，器物年代十分明確。商王在征討途中，巡視了夔、京二地，<sup>24</sup>小臣兪大概是陪同巡省，所以得到了商王所賞賜的夔地之貨貝。從商末稱名習慣判斷，「小臣兪」之兪，殆為族氏名號，同時也是該族氏組織的居地之名。<sup>25</sup>鄙意以為，兪與夔、京二地，極有可能是相互比鄰的，也正因為地理上的相近，故兪族首領才會陪同商王一起巡視夔與京。<sup>26</sup>

按京地又見於《合集》33209，其辭曰：

癸亥貞：王【令】𠄎衰【田】……  
 癸亥貞：王令多尹𠄎田于羸(?)，受禾。  
 癸亥貞：多尹弼其受禾。  
 ……  
 乙丑貞：王令𠄎田于京。  
 于羸𠄎田。(歷組)

本版卜辭的最後兩條一說衰田於京，一說於羸衰田，屬於對貞卜選卜辭，依照常理推測，作為卜選地名的京與羸，或相去不遠。眾所周知，春秋時期汶水上游有一羸邑，乃齊國著名邊邑，魯桓公會在此地與齊侯盟會，<sup>27</sup>卜辭的羸地恐怕與之相關。所以，京地亦當在其附近尋求。而著名的戰國早期三晉器羸羌鐘銘（《集成》157）亦見「京」之地名，從其「厥辟韓宗，徹率征秦，笱（迫）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武倭寺力，襲奪楚、京」云云之辭判斷，京大概就在齊長城以南的平陰、肥城一帶，東距羸地殆在一日行程之內。

至於夔地，據卜辭推斷，大致亦位於今泰山之南麓。例如：

丙申<sup>[33]</sup>貞：王步，丁酉<sup>[34]</sup>自𠄎。

24 按：銘文中的夔與京，也有學者聯讀而視作一地。不過將卜辭及東周羸羌鐘銘一併考慮的話，分作兩地可能更為恰當。

25 陳絜，〈從商金文的「寢某」稱名形式看殷人的稱名習俗〉，《華夏考古》2001.1: 87-93、109。

26 商周金文中類似的旁證甚多，如商末史族首領牽擒獲「人方雍伯」（牽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303）、周初彌劫協助成王征奄（彌劫尊，《集成》5977）、康王時期旅追隨召公伐反夷（旅鼎，《集成》2728，山東黃縣歸城曹家村出土）等，均是因為地理位置上的臨近。

27 《春秋經》桓公三年。

戊戌<sup>[35]</sup>……王步……

戊戌<sup>[35]</sup> 貞：王于己亥<sup>[36]</sup> 步巽。

庚子<sup>[37]</sup> 貞：王步自壹于桐（？）。

辛【丑】<sup>[38]</sup>……今夕不延雨。

壬寅<sup>[39]</sup> 貞：王步，自桐于夔。（《屯南》2100，歷組）

這是一版以占卜商王出行、並夾雜卜問沿途天氣陰晴的王步卜辭之殘版，整個行程以巽爲出發點，先是丁酉從巽到某地，己亥日則又返回至巽。隨後又從巽地出發，依次抵達壹、桐與夔等地。適可以注意的是壬寅日從桐到夔的占卜紀錄。參照黃組王步卜辭的一般情形，一條卜辭中其起始點與目的地的距離通常是在一日行程之內，超過一天的大概僅有有數的幾條而已，如《合集》36501 所載從商（鄭）到樂（灤），《合集》36751 所載從貞到香、從香到杞，《合集》41762 所載從舊到滅（成）等等，當然，這裡面或存在駐蹕整體的情況，實際的行進時日可能要比簡單的干支間的繫聯要短一些，所以，桐、夔二地想必不會相去過遠。

據周初桐劫尊銘文（《集成》5977）記載，東土部族桐族之首領桐劫，曾參與成王征蓋（奄，也即今山東曲阜）之戰事，其族居地或在奄之附近。而《俄羅斯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藏殷墟甲骨》189（歷組）有云：「甲戌貞，王令剛哀田于羸。」其同文卜辭亦見於《屯南》499。按剛也即桐，鄭傑祥、裘錫圭等前後均有說明。<sup>28</sup> 而羸地與博邑接壤，二邑同處於汶水流域上游地帶。由此判斷，桐，即漢代剛縣，似應在奄與羸、博之間，大致就在魯都曲阜以北、汶水沿岸的鑄地附近，也即今寧陽縣東北。<sup>29</sup> 由此地溯汶水而上，一日之內便可抵達羸邑。而從桐地到泰山南麓的平陰或肥城，差不多也是一天的行程。所以，今將夔地安排和平陰或肥城，還算穩妥。這也比較符合小臣兪犀尊銘文中夔、京聯稱之敘述方式。總之，商王巡察夔、京二地，由兪族首領「小臣兪」陪同，實出於兪地密邇夔、京之故。

按榆、兪均以「个」字爲諧聲偏旁，二字可通。考慮到小臣兪犀尊與大保家族器物同地出土，故大致可推定，大保奭所受之榆土原本當屬有商臣僚

28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 185；裘錫圭，〈桐伯貞的形制和銘文〉，載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 122-131。

29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頁 185。裘錫圭，〈桐伯貞的形制和銘文〉，頁 128。

小臣兪之領地。但隨著商王朝的覆滅，加之周初紂子聖叛周行動的失敗，兪族氏組織及其土地與宗廟重器等，一併被有周佔有，並最終成為召公奭的領邑。這恐怕就是周初大保家族器中夾雜商末兪族重器的真實原因之所在。

### 三、「湯沐之邑」與周代巡狩之制

「湯沐邑」一詞，乃東周以降尤其是秦漢文獻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名詞，但其含義於各家稍有分歧。如《禮記》〈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這就是說，諸侯所領有的湯沐之邑，均位於王畿或京畿地區，乃緣朝覲天子之需而設。然則，按照《公羊》家的說法，方伯為朝覲天子而受的王畿之領邑，其名為朝宿邑，與之相對應者為湯沐邑，乃與方伯追隨天子巡狩四方，特別是天子東巡狩柴祭岱宗有關，故皆設置於泰山之下。而漢儒許慎之說與《公羊》家相似，以為「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sup>30</sup> 其後以杜預為代表的《左傳》家亦取此說。本文所採納者，乃《公》、《左》與許氏諸家之說。

按兩周湯沐之邑，明確見於文獻記載者有二。其一為鄭之祊田，例如《春秋》經傳有云：

- (1)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春秋經》隱公八年）
- (2)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左傳》隱公八年）
- (3)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經》桓公元年）
- (4)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左傳》桓公元年）

上述材料其內容是前後銜接的，主要講述鄭、魯二國互易祊、許之田的前後經過與易田緣由。祊的性質，《左傳》認為是鄭國用於祭祀泰山的土田。但鄭國為何能在泰山腳下擁有一片土地、其性質如何、諸侯國何以能夠祭祀東嶽泰山等等，《左傳》本身沒有任何解釋。而《公羊傳》則明確提出，認為邶（即左氏經傳之「祊」）乃鄭國「湯沐之邑」，「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兩相結合，鄭國祊田的性質與作用也

30 清儒孫希旦引許慎之說，參氏著，《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396。

就比較清楚了。

不唯如此，古濟水以西的衛國，在泰山腳下同樣有其「湯沐之邑」，例如衛大夫祝佗（子魚）祖述周初封建云：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葆、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四年）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一句，杜注云：「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其主旨與前引《公羊》說同。此說亦被現代學者所接受，如楊寬認爲：「東蒐，即指王到東土舉行大蒐禮，也就是巡狩。」<sup>31</sup>按相土之東都，在今泰山附近，<sup>32</sup>而衛國以之爲湯沐邑，以作助祭泰山之需，其性質與鄭所擁有的泰山祊田完全相同。總之，就文獻記載而言，諸侯國在泰山腳下領有的湯沐邑，是與周天子巡狩東土之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筆者認爲，召公所受之榆土，其性質恐怕亦屬湯沐之邑。衆所周知，召公的封國在燕，也即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帶，據克罍（《新收》1368）、克盃（《新收》1367）<sup>33</sup>銘文「命克侯于匱（燕）」云云之辭可知，實受其國者乃召公之長子燕侯克，<sup>34</sup>召公奭本人則與周公等一起留守京師，以輔佐成王。故其宗族中以召爲氏的一支，一直活躍於王畿地區，歷任王朝之卿士，如河南洛陽北窯墓地<sup>35</sup>及洛陽東郊 C5M903 西周墓<sup>36</sup>所出的召氏青銅器並是明證。但燕召家族重器何以在山左出土，燕召宗族爲何在泰山腳下有一處飛地，過去一直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然則，若以巡狩制、湯沐邑

31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702。

32 王國維，〈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2，頁 515-516。

33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1368、1367。以下引用該書簡稱《新收》並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34 陳絜，〈燕召諸器銘文與燕召宗族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 卷，頁 16-25。

35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16-25。

3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 C5M906 號西周墓〉，《考古》1995.9: 788-791。

等先秦古制為視角，則飛地的存在便顯得順理成章。

據前引《左傳》祝佗之言，以東蒐為代表的周代巡狩制度，是伴隨成王時期的大規模封邦建國運動而確立起來的，乃王朝控制諸侯或地方勢力的一種制度設計。據史載，成王曾在泰山行封禪之禮，如《史記》〈封禪書〉中一則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再則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sup>37</sup>若是載可信，則成王封禪泰山一定是在平定東土之亂之後。而燕國始封，也恰恰是在這一時期，召公於領有北燕的同時，在泰山腳下獲得一片土地，其目的與功能顯然與衛國領有「相土之東都」類似，就是為了「以會王之東蒐」。典籍記載與出土文獻之間，恰好能夠相互發明，實乃幸事。故天子巡狩四土之制，想來亦非古人向壁虛造之說。

據《尚書》〈舜典〉記載，天子巡狩之制為「五載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史記》〈封禪書〉所記與之同。然則，這一定是一種理想化的藍圖而已，實際上不僅無此必要，也絕無嚴格付諸實施之可能。倘若五年四朝覲、一巡守成為現實，當時的最高統治階層如周王及列國諸侯，唯有舟車勞頓一生，其他的軍國大事恐怕都無暇顧及了。

當然，從具體的金文材料看，繼成王之後，像康王與穆王確實有巡行東土的舉措，可以補史載之闕。例如：

- (1) 王出狩南山，窀(蒐)遯(?)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啟從征，董(謹)不擾，作祖丁寶旅尊彝，用勺魯福，用夙夜事。戊簋。(啟卣，《集成》5410，圖三)
- (2) 啟從王南征，遯(?)山谷，在洧水上，啟作祖丁旅寶彝。戊簋。(啟尊，《集成》5983，圖四)

按啟尊、啟卣出土於山東黃縣歸城小劉莊，<sup>38</sup>其形制與紋飾具有比較鮮明的西周早期之特色，即器物最大直徑接近器底，使器腹略呈垂傾之勢，而器表紋飾樸素簡潔，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召卣(圖五·1)、召尊(圖六·1)極其相似。若以西周銅器五期法加以歸類的話，該器組接近於西周二期，也即

37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9)，卷 28 〈封禪書〉，頁 1361、1364。

38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5: 5。



1. 啟卣



2. 啟卣銘文拓本  
《集成》5410

圖三 啟卣及其銘文拓本



1. 啟尊



2. 啟尊銘文拓本  
《集成》5983

圖四 啟尊及其銘文拓本

康昭之世，更精細一些，便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時期。<sup>39</sup> 目前學界一般將其年代定於昭世。<sup>40</sup> 個別亦有視為孝世者，但此說不為他人所接受，故亦無須辯



1. 召卣



2. 召卣銘文

圖五 召卣及其銘文拓本



1. 召尊



2. 召尊銘文

圖六 召尊及其銘文拓本

39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126-1183。

40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5: 5；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64-265。

駁。眾所周知，青銅容器最大直徑的下移自康世甚至更早的成世便已出現，如著名的小臣單觶（成王，圖七·1）、「梁山七器」中的憲鼎（康王，圖七·2）以及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保員簋（康王）等，其器腹亦呈垂傾之態。所以，啓尊、啓卣未必非得晚至昭世，準確的年代還得依據銘文本身內容定奪。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過去之所以將其劃歸在昭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最初刊布原始信息的學者，把啓卣銘文中的「南山」一詞誤釋為「南土」，且將「啓從王南征」與史載「昭王南征而不復」事件相牽連，<sup>41</sup> 沒能細緻領會啓尊銘文「從王南征」的真實含義所在。此舉顯然對其他學者的後續研究在一定程度產生了先導性的影響。私意度之，唐蘭在《史徵》中將啓尊銘文劃歸昭王南征器組，恐怕與之有一定關係。



1. 小臣單觶



2. 憲鼎

圖七 小臣單觶與憲鼎

眾所周知，尊與卣乃商周時期最為習見的酒器組合，一般都是同時鑄造。若有銘文，則各器內容亦多關聯，甚至完全相同，如召卣與召尊所鑄銘文（圖五·2、圖六·2）即是顯例。從器物形制與紋飾判斷，啓尊與啓卣顯然是配套的成組器，係同時鑄造，故其銘文也應互相呼應。尊銘「啓從王南征」一句，事實上是卣銘「王出狩南山」、「啓從征」云云的簡約表述，這

41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5: 5、7。

一點齊文濤〈概述〉一文已提出過類似的意見。但它與昭王南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竊以為恐怕沒有絲毫的關聯。而且，銘文所涉及的「南山」與「洧水」，似屬東土地名。如若將該器組的出土地點與器主的身分等問題一併考慮，庶幾能夠認定，銘文所記實乃康王東土田獵巡狩之事，與昭王南征或王畿區田獵無關。

按卣銘「南山」一地，唐蘭依據《左傳》昭公十五年「守闕寨」服虔古注，以為是成周南山。<sup>42</sup>這當然是一種可行的解釋。但地處膠東半島，而其身分又僅為普通殷遺貴族的啓，千里迢迢遠赴成周，追從周天子在成周之南行田獵之事，雖說不無可能，然則總是有些不近事理。實際上，在時代更早的先秦史料中，還能找到屬於東土地名的「南山」。例如《詩經》〈齊風·南山〉有云：「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毛傳曰：「南山，齊南山也。」又如《繫年》有曰：「齊人焉始為長城於濟，自南山屬至北海。」可見，東周時期於齊境之內亦有一「南山」，其具體位置初步估計是在作為齊長城西端起始點的山東平陰附近。若進一步與尊銘「洧水」地望協同考慮，則卣銘「南山」在東土的可能性，要遠大於唐蘭所主張的王畿地名說。

按穆王時期的史密簋銘文（《新收》636）言及：「合（獻？）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蕘不墜，廣伐東域。」這裡的舟夷，乃東夷部族中的一支，其活動區域當與活躍於今山東新泰一帶的杞夷相臨近。而《左傳》哀公二十一年有云：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孔疏曰：「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為魯不稽首而為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顧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五十里。《詩》『韋顧既伐』，此即夏商時顧國也」。大體可從。陽穀，在今平陰以南、汶水以北的古濟水東岸。杜注云：「舟道，齊地。」所以，舟道的大

4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 264。

體位置當離陽穀不遠，似應在汶水以北、平陰以南一帶。商周時期，地名與水名往往一致，如殷墟卜辭中商地之水稱滴、成地之水稱減、畫地之水稱澧、樂地之水曰灤、麥地之水曰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洧水」大概就是舟地之水。同時早先活躍在舟地的夷族稱「舟夷」，舟地之道路則謂之「舟道」。水名、族名與道路之名，相互關聯，互為呼應。

若說南山、洧水均在齊境或其附近，則地處今黃縣歸城一帶的殷遺貴族啓，他在周天子巡狩東土的過程中追隨田獵，也就比較符合情理了。至於當時的周天子究竟是康王還是昭王，目前當然還可以繼續討論。不過，筆者更傾向於康王。因為昭王之世，其經略重點在南土，傳世典籍與其他出土文字資料中亦未見有昭王東巡的線索。而康王時期，曾有大舉征討東土反夷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此於雪鼎（《集成》2740）、寔鼎（《集成》2731）、旅鼎（《集成》2728）、師旅鼎（《集成》2809）、保員簋（《新收》1442）、魯侯簋（《集成》4029）、小臣遯簋（《集成》4238）等一大批銅器銘文均有記載，而且啓組器與康王時期的旅鼎同出黃縣歸城，恐怕並非偶然，其內在的聯繫不得不認真考慮。所以我們認為，康王於平定東土叛亂之前後，在泰山一帶巡狩田獵與祭祀，<sup>43</sup> 相對而言，似更為穩妥。

除成王、康王以外，以喜好周遊天下著稱的周穆王大概亦嘗東巡，例如穆公簋蓋銘文有曰：

唯王初女（如）（寔=寔），乃自商自（次）復，還至于周。王夕饗禮于【大】室，穆公友（侑），孚。王呼宰利易（錫）穆公貝廿朋，穆公對王休，用作寶皇簋。（《集成》4191，西周中期，圖八）

穆公簋蓋之年代，李學勤以為在穆王時期，<sup>44</sup> 當可從。這裡比較關鍵、且釋讀存有分歧的一個字就是「」字。<sup>45</sup> 按該字由三部分組成：其右邊所从殆為邑字，唯「口」形略殘；左下所从筆劃略有殘損，但為皿字無疑；左上部分比較麻煩，但最上方的「屮」形與其下左右對稱的兩個類似於「人」形還算清晰。然則，竊以為它極有可能便是卜辭「寔」字的異構。眾所周

43 按保員簋銘提到「唯王既燎，厥伐東夷」，竊以為其燎祭舉動或與柴祭泰山有關。

44 李學勤，〈穆公簋蓋在青銅器分期上的意義〉，《文博》1984.2: 6-8。

45 彭曦、許俊成，〈穆公簋蓋銘文簡釋〉，《考古與文物》1981.4: 27-28。郭永秉，〈穆公簋蓋所見周穆王大蒐事考〉，《復旦學報》2012.5: 130-140。



圖八 穆公簋蓋銘文拓本  
《集成》4191

知，卜辭寔字一般从止（趾）而作「𣎵」（《合集》37745）、「𣎵」（《合集》37745）、「𣎵」（《合集》37747）之形，通過比較似不難發現，「𣎵」字左上所从實為卜辭「寔」字的上半部「𣎵」，可隸定為「畝」，所以整個字當隸寫為「鄗」。又《合集》36553、36561、37757「寔」字省「止（趾）」寫作「𣎵」，這就是說，「鄗」字音讀應該與「寔」無別。黃組卜辭中「寔」為重要的田獵地名，而「鄗」从邑，又銜接於動詞「如」字之後，屬地名無疑，其前身極有可能就是晚商卜辭田獵地「寔」。

按諸黃組田獵卜辭，「寔」經常與榆、宮、晝、敦、孟、喪等地名同組出現，它距榆地至多一日行程，例如《合集》41811 有云：

戊子<sup>[25]</sup>卜，貞：王田剌（？），往來亡災。茲卜孚，獲狐十。

辛卯<sup>[28]</sup>卜，貞：王田榆，往來亡災。

壬辰<sup>[29]</sup>卜，貞：王田寔，往來亡災。（黃組，摹本）

辛卯、壬辰前後銜接，說明榆、寔距離甚近，其中的榆地竊以為在肥城句窰亭一帶。<sup>46</sup>該版卜辭其戊子日的田獵地摹本作「𣎵」，或為「𣎵」（剌=

46 陳絜，〈〈壘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古文字與古代史》第4輯，頁275-277。

索)」字之誤摹，按索地在今兗州李官莊一帶。<sup>47</sup> 依照商末田獵時日禁忌，甲、丙、己、庚、癸五天一般不行田獵，所以憲、索二地亦非常接近，並不需要走上四天方可抵達。

再如卜辭中憲與𠄎相鄰，試看下引資料：

……

己酉<sup>[46]</sup>卜，在𠄎（憲）貞，王今夕亡咎。

辛亥<sup>[48]</sup>卜，貞，王今夕亡咎。在𠄎。（《合集》36553，黃組）

按《合集》36553 是一版非常著名的卜夕卜辭，它可以與《合集》36550 實綴在一起，<sup>48</sup> 同時蔣玉斌認為還能根據內容與《合集》36549 進行遙綴，其說可從。其中《合集》36553+36550 為整個龜版的右上部，上引兩條卜辭大致處在龜版上半部右甲橋位置，與之對應的左甲橋的上半部，同樣應該刻有兩條卜辭，其中當包括庚戌日的占卜紀錄。殊為可惜的是，在現有的甲骨著錄書中沒能找到相應的材料，以作驗證。然則即便如此，憲與𠄎邑最多兩天行程這一點已是確鑿無疑，而且不能排除甚至僅為一天距離的可能性。此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𠄎乃地方中心聚落「商」（也即春秋時期的鄆邑）的鄙屬之邑，在汶水下游的中段附近。<sup>49</sup> 將上述線索綜合在一起，我們推測，憲應該就在鄆邑以北、泰山以南的「汶陽之田」的範圍之內，距離鄆邑大概就是一天的行程。又穆簋蓋銘中「商自」，可以讀作「商次」，這在卜辭及商周金文資料中有不少例子，此不贅。根據憲的地理位置推測，並結合周初小臣單觶銘文（《集成》6512）「克商，在成自（次）」云云之辭，這裡的「商」，也應該就是汶水流域上的鄆邑。

周穆王巡視憲邑之後，從鄆邑出發返回岐周，其行進路線是合乎常理的。我們知道，汶水與古濟水的交匯處，也即當時大野澤的北端（今山東梁山附近），恰恰就是中原與東土交往的重要渡口。周穆王順汶水而下，至古濟水

47 郭克煜等，〈索氏器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文物》1990.7: 36-38。

48 王恩田，〈商周甲骨文綴合舉例〉，《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42-157。

49 參陳絜，〈〈墾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頁284；陳絜、趙慶森，〈「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孟」、「𠄎」諸地地望考察為中心〉，頁70。

而西渡入衛，進而成周、宗周，最終返回周（岐周），<sup>50</sup>所走線路，恰恰就是周代最爲重要的東西交通線。周穆王何以巡行於泰山南麓的寔邑，或與班簋銘文（《集成》4341，穆王）所記載的疇戎作亂於東土、毛班「三年靜東域」的軍事行動有關。當然，從中也反映出穆王喜好周遊天下的習性。這是另外一話題，就不再多說了。

####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大體可得出如下幾點簡單結論：

1. 大保簋銘「錫休榆土」的榆地，大概是在泰山的周圍，在今山東肥城句瀛亭一帶的可能性爲最大。所以，「梁山七器」的出土地也應該在肥城一帶。

2. 大保簋銘「榆土」，也即商末田獵卜辭中的田獵點榆，一度屬商王近臣「小臣兪」所有，但隨著商王朝的覆滅以及周初紂子聖叛亂的平定，成王便將榆地賞賜給了立有戰功的大保奭，小臣兪犀尊與大保家族重器同出一地的原因便在於斯。

3. 燕召家族在泰山腳下所領有的榆地，其性質與鄭之祊田、衛國的「相土之東都」相同，均屬「湯沐之邑」，也即諸侯用於協助周天子祭祀東嶽泰山的土地。

4. 湯沐邑的設置與周天子巡狩東土的制度有關，但西周十二王中真正巡視東土的目前所知僅有成王、康王與穆王，周天子巡察四土斷然不能像禮家所規劃那樣嚴整，這就是現實與制度的差異。

此外，小臣兪犀尊銘中的「夔」與「京」，大概也在今山東平陰、肥城附近。而西周早期黃縣歸城所出的啓尊、啓卣所提到的「南山」與「洧水」，同樣屬於東土地名，應該在平陰一帶。穆公簋蓋銘中的「寔」，則在泰山南

50 金文「周」為岐周之說可參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 93-108；宗德生，〈試論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1985.2：55-58；陳黎，〈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資料為中心的考察〉，載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06-167。

麓的「汶陽之田」範圍內。這對日後商周東土地名的系統梳理，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9。  
唐·孔穎達等，《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4。

### 二、近人論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78-1982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4-1994 《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5 《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尹盛平主編 1992 《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恩田 2002 〈甲骨文中的濟南和趵突泉〉，《濟南大學學報》2002.1: 39-42。  
王恩田 2012 〈商周甲骨文綴合舉例〉，《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42-157。  
王國維 1984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  
朱鳳瀚 1998 〈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與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載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遠望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頁303-308。  
朱鳳瀚 2009 《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鎮豪 2005 《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學勤 1984 〈穆公簋蓋在青銅器分期上的意義〉，《文博》1984.2: 6-8。  
李學勤 1993 〈克壺克盃的幾個問題〉，載常宗豪、張光裕等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頁309-349。  
李學勤 2011 〈紂子武庚祿父與大保簋〉，載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4。  
(日)貝塚茂樹 1993 〈關於殷末周初的東方經略〉，載劉文俊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頁58-121。  
宗德生 1985 〈試論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1985.2: 55-58。

- (日)松丸道雄 1996 〈再論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問題〉,載吳榮曾編,《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45-56。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1995 〈洛陽東郊 C5M906 號西周墓〉,《考古》1995.9: 788-791。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1999 《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胡厚宣 2002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唐 蘭 1986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
- 殷璋璋 1990 〈新出土的太保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90.1: 66-77。
- 殷璋璋、曹淑琴 1991 〈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1991.1: 1-22。
- 殷璋璋等 1989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銘銅器座談紀要〉,《考古》1989.10: 953-960。
- 郝導華、董博、崔聖寬 2012 〈試論齊國的交通〉,載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 9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49-367。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201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
- 郭永秉 2012 〈穆公簋蓋所見周穆王大蒐事考〉,《復旦學報》2012.5: 130-140。
- 郭克煜等 1990 〈索氏器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文物》1990.7: 36-38。
- 郭沫若 1957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陳 平 1995 《燕史紀事編年會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 絜 1999 〈燕召諸器銘文與燕召宗族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16-25。
- 陳 絜 2001 〈從商金文的「寢某」稱名形式看殷人的稱名習俗〉,《華夏考古》2001.1: 87-93、109。
- 陳 絜 2009 〈鄒氏諸器銘文及其相關歷史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1: 13-26。
- 陳 絜 2011 〈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資料為中心的考察〉,載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06-167。
- 陳 絜 2015 〈〈壘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載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61-290。
- 陳絜、趙慶森 2015 〈「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孟」、「磬」諸地地望考察為中心〉,《歷史研究》2015.5: 56-75。
- 陳 壽 1980 〈大保簋的復出與大保諸器〉,《考古與文物》1980.4: 23-30。
- 陳雪香 2007 〈山東地區商文化聚落形態演變初探〉,《華夏考古》2007.1: 102-113。
- 陳夢家 2004 《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

- 陳夢家 2004 《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
- 彭曦、許俊成 1981 〈穆公簋蓋銘文簡釋〉，《考古與文物》1981.4: 27-28。
- 楊 寬 2003 《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裘錫圭 2012 《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齊文濤 1972 〈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5: 3-18。
- 鄒國盛 2012 「商周時期的東夷與淮夷」，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
- 劉 桓 2012 〈補釋甲骨文尋、暝二字並釋「降永」〉，《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29-136。
- 蔡哲茂 2004 《甲骨文綴合續集》，臺北：文津出版社。
- 鄭傑祥 1994 《商代地理概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 2006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 The “Seven Bronzes of Liangshan” and the Zhou Dynasty Imperial Inspection Tours

Chen Jie\*

### Abstract

The place name Yu 榆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Dabao *gui* (簠 bronze food vessel) actually refers to the hunting ground of Yu referred to in lat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connected with hunting. This territory once belonged to Xiaochenyu 小臣兪, a courtier of King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but following the suppression of Luzisheng’s rebellion in the early Zhou dynasty, was annexed into the private territory of Duke Shao 召公奭, roughly located in present day Gouyuting 句瀛亭 in Feicheng County 肥城縣, Shandong Province. The “Seven Bronzes of Liangshan” were therefore really excavated at a location somewhere near Feicheng, north of Liangshan 梁山. The territory of Yu at the foot of Taishan 泰山 belonging to the Shao clan of the state of Yan was similar in nature to that of Bengtian 枋田 in the state of Zheng 鄭 and the “eastern capital of Xiangtu” of the state of Wei 衛, which were places for ritual purification used by the eastern states to assist the Zhou kings when they made sacrifices to Taishan 泰山.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place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king’s inspection tours of the eastern territory. These tours of the whole kingdom were not, however, comple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tes. As far as can be seen from extant records, kings Cheng 成, Kang 康 and Mu 穆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ere the only kings who actually toured and inspected the eastern territory.

**Keywords:** Seven Bronzes of Liangshan, imperial inspection tour, ritual purification ground, Shang and Zhou geography, Yu 榆

---

\* Chen Jie is a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Texts and Culture Studies a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